·名家论坛·

DOI:10.20004/j.cnki.ujn.2025.02.001

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升级

贾玉娇,张译文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表征为上下贯通、内外融通、农民联通的行动者网络,具有"关系升级"的属性。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经历社会动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的机制升级。基于对山东省曹县孙庄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转型历程分析,机械动员是依靠地方性情境中能人及其情感关系而展开的表层事务导向型动员,通过能人带动并顺应村民跟随、模仿、从众的心理,达成"志同"的初级结合体构建目标;而有机动员是依靠开放性情境中制度塑造的村民间分工与协作而展开的深层结构导向型动员,通过建构村民积极、主动、创造性的价值观念,并重塑村民对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而达成"道合"的高级复合体构建目标。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机制升级中的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框架,有助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情理融合的关系升级何以可能的议题。

[关键词]机械动员;有机动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关系升级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2-0005-13

为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此,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新形态。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指出社会治理体系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①。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并再次明确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这给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是如何实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实践表明,对国家的政策、法规进行照本宣科式的执行无法实现上述建构目标,只有深刻把握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规律,才有可能变乡村振兴由政府行为为乡村内生行动、为农民视角下的"我的事情"。为此,本文尝试阐释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在凝练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构建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及升级的社会动员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到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ZD182)。

[作者简介]贾玉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邮箱:jiayujiao2007@126.com;张译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4页。

一、生态秩序与心态秩序: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维度

对农民进行社会动员的最终旨趣在于构建具有发展内生动力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换言之,在“制度—农民—具有发展内生性的农民—具有主体内生性的制度”等循环往复运动中,亦即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中,社会动员是制度作用于农民,实现制度外在目标与农民内在诉求相融合,进而实现乡村情境中在地化制度与内生性农民持续再生产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在上述结构的运动表象下隐含着社会动员与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根本问题:何以成共同体以及塑造何种人。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基于人的本性[①]。纵观人类社会及其政治组织形态的解释图式,其均包含着人与组织的辩证统一性。“物化”的人与作为“地上神物”的国家,“理性人”与“契约社会”等,都是建立在人的单一本性之上的社会与国家建构在化解人类社会与国家发展短期问题的同时不断强化其内在发展的悖论。例如,片面追求“理性人”的“契约社会”与“契约国家”会导致社会个体化程度加深、社会情感淡漠、社会道德式微、社会与国家治理的法治成本加大以及法治风险加剧。为对发展至今的人类社会复杂性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解释与回应,本文按照个体与社会分析框架展开分析。具体说来,在个体维度方面,运用感性与理性范式;在社会维度方面,运用费孝通在潘光旦“安其所、遂其生”的“位育论”基础上提出的“生态格局”与“心态格局”观。

(一)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成的内在机理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区分了“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的“共同体”与“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的“社会”[②]。共同体是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具体表现为家的血缘共同体、邻里的地缘共同体与宗教的精神共同体等。与之相对,社会则体现为依靠契约、理性观念、商业化、市场化而建立起来的想象的、机械的构造,社会内部的关联要素是个体行动者理性的利弊权衡、精于算计等选择意志,由此造成了个体的疏离、冷漠与对立等关系品质。涂尔干认为滕尼斯的社会观忽视了现代社会中的集体生活,是功利主义的,并认为大的社会集合体的生活与小聚合体的生活在有机性和内在性方面都不更少些[③]。因而,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传统共同体与现代社会均是具有社会团结属性的,区别在于传统共同体的社会团结表现为依靠集体道德而形成的机械团结,而现代社会的社会团结则表现为在保留个体的个性与差别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强依赖关系的有机团结[④]。

事实上,滕尼斯与涂尔干都关注到了感性与理性在人性中的不同构成及其外显的组织形态的不同。其中,感性是人所具有的超越于个体本位的体现人的“群体本性”和“类本性”的激情,表现为“关心他人或集体际遇,视他人与群体的幸福为自己之快乐与必须”。由人所具有的“群体本性”和“类本性”可将人的感性划分为具有个体性与天然性的“自然感性”与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的“道德感性”。与之相对,理性同样基于人的“群体本性”和“类本性”而呈现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基于此,本文以人的感性与理性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理,以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的公正的“生态秩序”和能保证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⑤]作为乡村社会治理共

①高清海,张海东:《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从人的本性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②斐迪南·滕尼斯著,张巍卓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1页。

③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④埃米尔·涂尔干著,渠敬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9-90页。

⑤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同体的构建维度。据此，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解构为从个体行动者的内生动力激活到促成社会行动，再到形成稳定的治理模式与行动者心智图式的动态实践过程，其中蕴含着从建设生态秩序（从自然感性及个体理性到集体、社会理性）升级到建设心态秩序（集体、社会理性与集体、社会、道德感性的互生互促）的过程。

为更好地解释这一动态升级过程，本文提出“共同体化”与“社会化”两个相互衔接、互为因果的环节。一方面，初始共同体的社会化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初级形态，表现为依靠特定能人及其情感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指向工具性目标的结合体，这有助于完善共存与和谐的生态秩序，形成乡村社会治理的规模效应。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共同体是未被社会动员的初始乡村社会整体。另一方面，社会的再共同体化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级形态，是对前一阶段所取得动员成效的定型与巩固，表现为依靠具有集体理性的制度而建构起来的、指向价值性目标的复合体，这有助于完善共荣与合作的心态秩序，形成与现代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相适应的农民主体性自觉意识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情感。

（二）初始“共同体”的社会化：“自然感性为体，个体理性为用”的关系拓伸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初级目标是形成具有一定参与人数规模的结合体，并打破乡村初始“共同体”的松散状态，以实现乡村初始共同体的社会化，即依靠自然感性和个体理性关系生成具有一定集体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建构起推动乡村发展的和谐有序的生态秩序。这里的“社会化”是基于源自传统社会某种连接的乡村社会整体逐渐吸纳建立在理性（价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为动机的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之上的社会行为调节机理的过程[①]。

据此，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初级阶段——乡村初始“共同体”的社会化需要生成具有集体理性的制度，进而实现更广范围内的关系联结，以顺应外部环境给乡村发展带来的新趋势，克服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内在障碍。这是因为，高度依附在地化自然资源的封闭型内聚的传统共同体状态已被弱化[②]，乡村社会已被纳入更大的治理体系之中，而自然感性关系具有一对一的对象指向性与面对面的情境限定性，难以完全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求。因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靠共同价值观念与共同利益实现跨越时空的制度联结，进而使共同体升级到开放型内聚状态[③]。概言之，强调共同体的社会化意味着要突破滕尼斯意义上的具有地理区域限制的共同体实体性意涵，突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功能性意涵，即人们基于特定目的共同结合而成[④]。需要强调的是，共同体的社会化并不是正式制度压制非正式制度，亦不是剥离理性行动的感性基础，而是依靠关系的理性化升级来塑造适应社会治理需求的主体性自觉意识。

（三）社会的再共同体化：“集体理性为体，道德感性为用”的关系内聚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高级目标是形成具有内生性、主体性与整体性的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化，即依靠理性化制度来促进主体或个体之间的分工协作，生成互动合作关系网络，并持续生成社会行为调节机理的过程[⑤]，亦即参加者在具有集体理性的地方性的制度情境中逐渐认识到彼此之间的一些共性，然后慢慢影响他们的行为以及相互关系的过程[⑥]。

---

①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页。

②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③李义天：《共同体：内涵、意义与限度》，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④徐勇：《关系—行为视角下的现代共同体构建》，《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⑤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第70页。

⑥王春光：《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据此,将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化划分为治理者的共同体化及社会的共同体化两个环节。一方面,乡村社会治理者的共同体化意味着整合国家、市场、社会工作者、基层官员、村民等多重力量,并"通过制度化的网络建设形成共同的目标,凝聚共享的价值观,建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①],从而形成治理主体间的功能型耦合关系。乡村社会治理者的共同体化最为关键的是要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②]。这需要完善农民利益沟通表达和维护的通道[③],动员广大农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摆脱农民的"去责任化"观念。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共同体化是在治理者共同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目标是具体化的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培育[④],进而实现共同体的社会整合、社会包容与社会支持等。乡村社会共同体化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实现感性关系的再生产,即生成道德感性[⑤],这既需要实现广度的关系升级,修复由社会分化造成的关系疏离与冷漠,还需要实现深度的关系升级,强化由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关系耦合与韧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民对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具有集体性与社会性的道德感性,实现心态秩序的构建。概言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深层维系机制是农民的情感认同,这构成理性化社会的感性基础[⑥]。

二、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分析框架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在释放乡村社会能动性与接受外部规则制约性的平衡中,重塑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并使其内生出兼具普遍性与地方性治理诉求的规则。因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重点在于促使村民个体接受并认同外部规则,生成共同体情感(具有集体性与社会性的道德感性),而社会动员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过程。

(一)社会动员:感性认同与理性认知的平衡

西方学者往往将社会动员视为现代化促成个体观念及行动转变的理性化机制。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动员发生在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其间个体行动者在文化、技术、经济生活、公共事务参与、居住条件等方面向现代化标准看齐[⑦]。但是,由于西方的社会动员研究更多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研究立场,假定社会动员是现代化结构变迁过程的结果[⑧],而忽视个体行动者的情感与能动性。事实上,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对"人"的使动性与塑造性作用上看,社会动员产生于现代化扩散及其与传统或既有社会存在状态之间的张力,普遍存在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凸显于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期。社会动员作为现代化作用于社会的实践机制[⑨],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在

①顾昕:《共同富裕的社会治理之道——一个初步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②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③司文晶,宣朝庆:《论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传统及其应用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④刘亚秋:《传统社区的乡土性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学术论坛》,2021年第3期。

⑤孙薇薇,景军:《乡村共同体重构与老年心理健康——农村老年心理干预的中国方案》,《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⑥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建构和谐社会的难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⑦Karl W. D.,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5, No. 3, 1961, pp. 493-514;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C. E. 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S. N. 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沈原,陈育国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⑧David R. C.,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6, No. 1, 1974, pp. 138-171.

⑨贾玉娇:《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逻辑，是外部规则内化于作用对象的意识之中，并转化为其自觉行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蕴含着个体行动者感性认同与理性认知之间的张力与平衡。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动员研究往往更加关注社会动员在联结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理性与感性等方面的作用，将社会动员解释为国家建构的正式制度向下转译并实现内生转化的过程，其目标在于实现人们的配合，并将分化的利益主体及其资源调动起来以凝聚成共同行动，实现超然于现状的社会发展样态。其中，感性与理性成为实现社会动员目标的内在机理。二者的构成、相互生成能力和水平既考验动员者的动员智慧，又影响社会动员效能。例如，早在民国时期，由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就体现出社会动员的思想。这些具有探索性的社会运动在推动乡村生活方式变革、农民价值观念转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产生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动员悖论[①]，其原因在于未能实践好理性观念与感性认同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社会动员依托权力关系网络、资源分配体系以及农民对革命理想的情感而展开[②]。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社会动员的理性化色彩突显，而感性化色彩减弱，进而导致乡村共同体解体。进入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动员既有着全国一盘棋的组织动员体系，又包含家国一体的价值联结体系[③]，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④]。由此可见，社会动员贯穿于现代化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进程始终，而有效的社会动员应是兼具感性认同与理性认知的融合过程。

（二）社会动员框架：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的提出

为阐释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机制升级，本文提炼了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两种相互继替的动员框架。“机械”与“有机”的提法借鉴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且在内涵上与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谓机械动员是在相对“不变”的特定地方性情境之中，动员者依据被动员者对能人的自然感性认同，凭借能人的社会关系存量或以其为中心的情感关系网络，达到社会动员目标——“变”的过程。由于此类动员具有由特定事件触发、并以解决该事件为导向的目标预设性特点，因而其动员效能往往指向完成特定事务。事实上，由能人带动的机械动员有着较长的历史。在传统社会中，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依靠能人的权威、感化、教化、首倡及非正式制度等得以维系[⑤]。尽管能人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是农民遵循经验与传统的延续、重复、守旧、参照、跟随等思维习惯的感性底色依然存在，这导致能人动员仍然具有较强的动员效力。然而，由于能人动员主要依赖于个体对能人的自然感性，所以其所能发挥的效力边界有限，即此种效力只能依赖于该能人，而无法被转移，导致治理效能受能人影响极大，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此外，机械动员并没有给个人爱好、感情和动机留出多少空间，导致农民仍处于被带动的状态。

所谓有机动员是在不断“变”的地方性情境中，依靠跨越时空的制度促使乡村个体生成影响个体意志与行为的“不变”的深层结构——道德感性与集体理性，进而促使乡村个体生成“共同体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403页。

②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研究》，2005年第1期；孙立平，晋军，何江穗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③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④习近平：《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

⑤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感”。为此,有机动员需要动员者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运用优势视角,帮助农民认识到自身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优势,引导其形成对自身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意义感知,从而将农民由被动的动员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能动的动员主体,并生成对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这也意味着,有机动员不再寻求完全同一性的农民跟随行动,而是在由个体差异性分工所形成的彼此需要、功能型耦合的基础上,注重激活每一个个体的力量,进而再生产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情感共通、发展共谋、事务共议的韧性结构。因而,有机动员的效能具有韧性、动态性与可持续性等特点。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整理了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的分析维度比较表,见表1所示。

表1　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的分析维度

分析维度	机械动员	有机动员
动员目标性质	预设性、刚性、同一性	实践性、弹性、共同性
动员目标	在不变的情境中推动变的转型	在变的情境中生产不变的深层结构
动员机制	从自然感性到理性(制度)	从理性(制度)到道德感性(共同体情感)
动员资源	关系存量(能人的“情”)	关系增量(制度塑造的分工协作)
动员机理	依靠农民跟随、模仿、效仿的自在心理	建构农民积极、主动、创造的自为观念
动员情境	相对封闭内聚的村落共同体情境	相对开放内聚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情境

从乡村社会治理的总体发展方向上看,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两种实践样态的相应实现机制,二者相互继替并在建成后共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正是在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增强韧性、内生性与持续性的。

(三)案例介绍:山东省曹县孙庄村发展转型历程

如何实现以“情感”为基础的“制度”向以“制度”为基础的“情感”的转化成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一些乡村社会动员开展较早且效果较好的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一转化的地方性探索。如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孙庄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开展了四次发展转型,这一历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机制升级特点。其中,第一次、第二次与第三次早期的发展转型体现出机械动员的色彩,而第三次后期与第四次的发展转型体现出有机动员的特点。

具体来看,孙庄村第一次发展转型始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体现为从“一茬米一茬棒”孙庄到“甜秫秸”孙庄。受制于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孙庄村农民闲暇时间较多且人均收入较少。孙庄村开始探索从土地上要效益的思路,改种有着较高效益与较好市场的甜秫秸。孙庄村由此被称为甜秫秸孙庄,村内也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万元户。与此同时,孙庄村还积极号召年轻人外出打工,这在提高村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使乡村社会联结机制发生变化。

孙庄村第二次发展转型始于1993年,体现为从“甜秫秸”孙庄到“蔬菜”孙庄,这是从土地上要效益思路的进一步延伸。由于甜秫秸一年只能种一茬,农民收入增长逐渐陷入停滞,孙庄村便推广能够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高效大棚蔬菜。由此孙庄村形成了“家家种蔬菜、户户有大棚、人人有活干、天天有收入”的局面,村内出现第二批万元户,并率先成为大集镇万元户最多的村庄。但与此同时,孙庄村外出务工年轻人逐渐增多,孙庄村也一度被称为光棍多、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的“三多村”,随之而来的是扯闲话、搬是非等村内矛盾与纠纷频发,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

孙庄村第三次发展转型始于2013年,体现为从“蔬菜”孙庄到“淘宝”孙庄,由此开启了孙庄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受2013年大集镇的其他两个村子参加首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的影响,孙庄村敏锐地捕捉到发展淘宝的潜力巨大。于是依靠孙庄村原有的演出服生产基础,加之部分懂技术的

外出务工年轻人返乡创业，孙庄村的电商产业开始起步，并于2014年被阿里巴巴评为“中国淘宝村”，形成了“家家做电商、户户有淘宝、人人开网店”的内生动力激活局面。同时伴随着年轻人返乡，孙庄村新的社会联结机制逐渐显现。

孙庄村第四次发展转型始于2019年前后，体现为从“淘宝”孙庄到“电商”孙庄。孙庄村将电商产业的主阵地从淘宝扩散至天猫、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并开启了电商直播与跨境电商等新模式。目前孙庄村内760多户家庭中，有500多户都在从事电商经营，共有淘宝店2600多个，天猫店500多个，电商直播店500多个。2023年，孙庄村电商销售额突破4亿元，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同时，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孙庄村的社会治理状况也在同步改善，外流人口返乡解决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生活治理难题。孙庄村从“三多村”变成了无违法犯罪、无留守老人、无留守儿童的“三无村”。

事实上，孙庄村的四次发展转型从表层来看是由产业转型的经济因素触发的，但是却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一方面，尽管不同阶段的发展转型有着不同的目标，但是其均需要落入具体的地方性社会情境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并实现转型效能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相较于散点式的、缓慢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电商等数字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速的、彻底的[①]。孙庄村电商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对乡村社会联结机制、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村民价值观念体系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笔者尝试对孙庄村改革开放以来四次发展转型中的动员机制进行阐释，并从中提炼出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机制升级路径。

三、机械动员：能人带动、村民志同与“叠加”的初级结合体构建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初级形态是依靠能人带动而凝聚起村民共同的发展志向，进而建立起来的结合体。这也意味着此时的社会动员目标是积累足够多的参与人数，从而形成“叠加”的规模效应。而机械动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机制，呈现出从能人到关键群体再逐层向外扩大动员范围的路径。孙庄村前三次发展转型具有较为明显的机械动员色彩，表现为孙庄村村民在特定能人（孙书记）的示范带动作用下，生成对某一行动或规则的主观认知与认同，并采取与目标要求相符合的行动，或结成与目标要求相适应的关系网络。

（一）“穷”则思变：孙庄村机械动员启动的内生感性动力

在相对封闭、稳定且守成的地方性情境中，要想实现具有一定超越性、引领性与前瞻性的社会行动，能人自身的动力启动及其对其他村民的带动必不可少。改革开放以来，孙庄村发展转型均离不开孙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书记）的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头作用。孙书记于1987年进入村党支部跟着老支书开展工作，自1992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这三十余年间，孙书记始终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为治村动力与价值目标，团结带领全村村民脱贫致富，并于2022年被选举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具体来看，孙书记推动孙庄村发展转型之“变”的动力更多来自感性的认知与认同。

其一，孙书记“要我做”的感性动力表现为上下的双重期待所赋予孙书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孙书记具有由大集镇党委任命的村支书与由孙庄村村民民主选举的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交叉任职的双重身份，这同时也意味着孙书记需要满足并平衡好上下的双重期待。在孙书记看来，“一心想法就是怎样把整个村搞好了。群众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全体党员都认可你，都支持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做不出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看不到发展前景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愧对群众”（访谈记录20240522-A）。可见，作为孙庄村的“当家人”，孙书记对孙庄村及村民是有感情的，并对自身所处位置及承担的责任有着感性认知，“要对孙庄村与村民负责”的价值观念成为孙书记推动发展

①邱泽奇，乔天宇：《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转型的内生动力。

其二,孙书记“我要做”的感性动力表现为孙书记自身感知到的乡村发展“紧迫感”与“危机感”。而这种感知意识与能力往往是普通村民所不具备的。这是因为,村民更多秉持着相对保守或“小富即安”的价值观念,容易安于现状,不愿突破相对稳定的生产与生活惯习,同时难以预见到发展转型的潜力与隐性利益。即使部分村民有着较为强大的内生动力,但受制于信息、能力与资源的欠缺,难以将内生动力有效转变为发展动能。而孙书记则更加具有推动“变”的魄力与格局,意识到孙庄村村民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条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便下定决心带领村民脱贫并持续致富。

其三,孙书记“我能做”的感性动力来自孙书记具有的正式权力认可与非正式权威认同。一方面,孙书记有着较强的政策执行力、信息捕捉力、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在长时段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孙书记的治理理念均能与国家政策方针、地方政府发展重心保持一致,因而更容易获得上级政府的政策与资源支持,这是能人动员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村民往往会追溯生平情境中的传统与经验,来寻求安全感,而孙书记带领村民开展的前几次转型行动都成功了,信任、人缘、口碑、魅力、感召力、亲和力与治理能力的累积再生产构成村民对孙书记权威的感性认同,这是能人动员的社会基础。

据此,内生感性动力是能人推动乡村发展转型的启动力,而能人在自我启动之后,运用以“情”为基础的动员策略强化对其他村民的带动力。此种策略有助于摆脱服从性动员的悬浮与僵化风险。在孙庄村的发展转型中,孙书记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支配者,而是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与设身处地的共感来动员村民的引导者。同时,孙庄村村民考量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理性的利弊权衡与利益得失,而是“大家跟着孙书记一起干”的感性动力。此种感性动力蕴含在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积淀中[①],感性动力的激活则需要依靠历时性人情交往中的情感积累与共时性社会互动中的情境营造。

(二)历时性的情感认同:孙庄村机械动员的能人带动

机械动员依靠能人在具有相对性边界的村庄内部及长时段的历时性社会交往互动中所积累的私人情感关系而展开。情感既包括村民对卡里斯玛式权威的崇拜、欣赏、信任等[②],也包括具有公共性的乡土情结、乡愁等。

其一,能人依靠情感关系,实现以点带面的动员,进而依靠“关系的关系”,实现二次动员。在孙庄村发展高效大棚蔬菜的最初阶段,孙书记动用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村民的参与。此时,村里老龄化严重,并且老年人的思想相对保守,认为种植甜秫秸已可以满足生活温饱,于是对改种蔬菜持否定态度。但是孙书记预见到甜秫秸的市场趋于饱和,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直接影响村民增收。为此,孙书记自己建了5个蔬菜大棚,并多次外出学习,将技术分享给其他村民。同时,孙书记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人、朋友、邻居开始展开动员,通过讲述同甘共苦的集体记忆并使用推心置腹的非正式话语来拉近彼此距离,依靠“动之以情”的策略形成关键群体。继而,孙书记动员处于关键群体中的村民再次利用自身的情感关系网络展开二次动员,实现连带式吸纳[③]。在此过程中,孙书记还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筹资,完善种植大棚蔬菜所需要的机井、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然而,在面对关系较远的村民时,孙书记依靠自身的关系可能较难产生足够的情感说服力,便转而寻求其子女的帮助。这是因为部分年轻人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对市场行情有一定了解,能够理性地预判种植大棚蔬菜的潜在收益,而留守在家的长辈对年轻人有着较为充足的信任

①罗胤斌,刘少杰:《乡村电商发展中的感性秩序——以山东曹县D镇服装电商产业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乔纳森·H. 特纳著;孙俊才,文军译:《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邓燕华,阮横俯:《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感。于是，孙书记通过“晓之以理”的方式动员外出务工人员给家里老年人打电话，进行情感劝说，以逐渐改变村民意愿。

其二，能人依靠乡土文化象征符号与精神纽带，激发村民的乡土情结与对村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比如孙庄村在推动电商发展的最初阶段，遭遇了村民（特别是老年人）的不信任。孙书记意识到乡村电商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因而必须要有以青壮年为主的中坚力量参与其中，而有着一定眼界、技术和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成为孙书记动员的目标对象。为此，孙书记利用春节假期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契机而展开动员，通过组织非正式的茶话会，摆放老照片、老物件以及展现村庄新面貌、新变化等方式，实现在相对轻松愉悦的场景中激发外出务工人员的乡土情结与认同情感。并在此基础上，从发展前景好、需要你们支持、有演出服生产基础、照料老人方便等方面引导其返乡进行电商创业。而返乡人员在创业初期往往以家庭为单元组建团队，这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更强的风险共担韧性与利益共享意识，由此实现了对家户的动员。在返乡创业者及其家庭的带动下，乡村电商产业的收益凸显，逐渐使电商经营的范围从一家一户到一个街道，再到一个村落，最终扩散至其他村庄。

（三）共时性的情境营造：孙庄村机械动员的村民“志同”

情境动员依靠地方性情境中的农民参与情绪传递与情境感知来展开动员[①]。之所以强调动员的情境性，是因为共时性、在地化的情境构成农民认知并认同动员目标的载体，且情境动员顺应了农民效仿、模仿、从众、跟随等感性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②]。

其一，共时性情境营造有助于依靠能人及关键群体的示范带头作用而铺垫、渲染与传递村民共同参与的情绪。比如在动员村民改种大棚蔬菜时，孙书记采取党员带头的策略。党员的配合既来自自身的觉悟，也来自孙书记的道德感化，由此形成关键群体，并营造共同参与的情境。在此情境中，“老百姓一看，种一亩蔬菜产出的经济效益比种十亩小麦还高，就开始模仿效仿”（访谈记录20240522-A）。同样，在修建道路时，孙书记亦采取调动情绪的方式来提升村民积极性。比如孙书记每天会通过喇叭讲话给村民鼓劲，并在讲话前播放旋律高昂且激励人心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着“要上工”的信号。此外，简单易懂且生动的动员口号亦成为传递情绪的载体。比如孙书记在引导年轻人外出打工时，提出了“不恋家乡三分田、外出务工挣大钱、一人在外打工、全家脱贫致富”的口号，而在动员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开淘宝网店创业时，提出了“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淘宝”的口号。这些口号隐含着特定情境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引发了村民的情感共鸣，具有鼓舞人心的感染力与解释动员目标的功能。

其二，共时性情境营造有助于推动村民感知制度及行动的意义，进而促成其观念转换与对动员目标的内生认同。比如为破解电商发展初期的村民不认同困境，孙书记组织带领部分村民到周边的大集镇电商发源地（丁楼村）进行实地考察。“看人家（丁楼村村民）是在干什么，人家也是敲着键盘听着歌，接着订单挣钱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是人家换了网络经济的市场。要让他（孙庄村村民）近距离去感受”（访谈记录20240522-A）。可见，孙书记通过村民实地考察的情境营造与身临其境的感知强化，使村民逐渐转变对电商的刻板印象。在此基础上，孙书记将种植蔬菜与经营电商的发展潜力、工作强度、收入等进行对比，村民逐渐发现电商创业门槛并没有原本想象的那么高，依靠家庭内部的生产分工也能维持运转，同时意识到电商的优势，并最终选择参与其中。由此，具有共同发展志向的村民结合体得以成型，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电商经营网络得以形成。

①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②刘少杰，周骥腾：《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期。

四、有机动员:制度促动、村民道合与“涌现”的高级复合体构建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级形态是依靠“好的”制度夯实社会信任,激发并累积村民的主体性自觉意识、内生动力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情感,而建立起来的复合体。制度是规范性与促动性、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①]。制度促动下的社会动员目标不再是动员人数的“量”的积累,而是形成更深层次的结构与更具韧性的“道合”治理秩序。为此,有机动员旨在动员村民围绕共同发展方向而展开分工协作。孙庄村在电商产业发展成熟期的动员策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有机动员色彩,即依靠制度的延展性对村民进行赋权与赋能,并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复合治理网络[②],将乡村全体社会成员纳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

(一)“富”则思远:孙庄村有机动员启动的内生理性动力

孙庄村的前三次发展转型已基本实现带动村民致富的目标,而在经济收入具有一定保障的前提下,孙庄村两委开始探索更具持续性的治理模式。这是因为,强烈依赖特定能人的机械动员在积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社会性能量的同时,容易导致此种社会动员框架及其所塑造的社会共同体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具体来看,当能人抽离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后,由能人所生产的社会动员效能及其制度产物可能会随之失灵、失效。即使能人没有抽离,机械动员也可能面临动员效能随时间推移而后劲乏力困境。并且,能人由近及远的情感关系动员存在着村民参与程度的圈层化差异[③],容易导致动员范围局限在特定网络之中,难以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公共领域[④]。此外,能人力量过强还容易导致农民表达被代替。除具有这些普遍性困境外,孙庄村的电商产业发展亦存在着体量的无序扩张、产品类型的同质化、质量的良莠不齐、创新能力不足等实践困境,容易加剧社会不信任与关系疏离。孙书记意识到过于依靠能人的社会治理模式可持续性较弱,进而萌生出建构新秩序的想法。为此,以孙书记为带头人的孙庄村两委开始探索推动孙庄村社会治理秩序变革与模式转型,通过强化村民的内生动力及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情感,实现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的升级。

此种社会关系升级是在具有一定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展开的。孙庄村电商产业在迅猛发展并重构乡村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影响着乡村的社会结构[⑤]。随着村民收入的增长,村民开始意识到尊重、审美观等精神层面生活改善的重要性,这是隐藏在中国人价值秩序之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体现,同时村民亦意识到互助、合作等道义秩序再生产的必要性,这是隐含在中国人互动策略之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体现。基于此,孙庄村两委通过制度建设形成村民间有效的分工协作关系,强化致富带头人“先富带后富”的带动作用,并推动村庄整合,增强村庄活力,持续提升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孙庄村发展需要建构起完善的制度与组织基础,强化村民对共同体的内

---

①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李友梅等:《解码社会建设的思想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6页。

②狄金华:《被困的治理: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1980—200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96-297页;徐勇,李华胤:《现代社会、社会治理的“共同性”构建与实践探索——兼论微观场域中的“共同缔造”》,《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5期。

③叶敏:《政策撬动社会:村庄行动的同意动员》,潘天舒,赵德余主编:《政策人类学:基于田野洞见的启示与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薛雯静,宋丹丹:《圈层中的“农民主体性”:基于S省芳林村“美丽乡村保护项目”的研究》,《社会》,2024年第2期。

④张静:《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XW案例的事件史分析》,《社会》,2020年第5期。

⑤邱泽奇:《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生情感认同，形成心态秩序，而这需要将党建力量更好地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之中。政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可以以自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弥合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打破多元主体之间的边界，激活基层治理的活力[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②]，孙庄村以此为乡村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导向，探索“电商人才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的“支部+电商”治理模式。孙庄村有机动员主要发生在推动电商产业发展与升级的成熟期，具体包括“赋权”与“赋能”的动员策略。

（二）纵向到底的赋权：孙庄村有机动员的制度促动

“纵向到底”意味着夯实农民主体地位，并通过制度建设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乡村整体发展中，使之共享发展红利。

其一，县级政府搭建起“政府搭台、农民唱戏”的治理框架。曹县近年来把电子商务作为推动经济转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其电商发展模式被概括为“一核两翼”[③]，“一核”即以农民致富、草根创业为核心，“两翼”即为服务型政府与电商平台的双向赋能。可见，曹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注重由广大农民依托本土的产业基础发展电商并致富，而县委、县政府则在电商产业园区建设、优化电商企业审批流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改善公共设施配套等方面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此种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的政府治理理念有助于破解政策与资源的“最后一公里”供给不足困境，并提升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其二，孙庄村党支部开展瞄准村庄能人的引育结合培养制度建设，以此实现孙庄村能人的范围扩散与能人的多重身份叠加，并构建起常态化、制度化的村民利益表达渠道。孙庄村党支部注重通过“引”的方式赋权外来能人。比如孙庄村党支部利用来自天津的服装设计公司到村调研的契机，动员该公司负责人CL留在孙庄村创业。基于CL扎根孙庄村后，捕捉到电商直播与汉服文化产业的增长点，孙庄村党支部便向CL赋权，使其协助孙庄村构建起包括设计公司、生产产业、电商销售大楼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系统化电商发展体系；同时，促使其推动孙庄村从电商产业发展转型至文化产业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融入服装的设计与电商销售等环节。

此外，孙庄村党支部还注重通过“育”的方式赋权本土能人。孙庄村党支部实施面向电商能人与党员的“业务+觉悟”双培养赋权制度，以提升能人的经营能力与团结能力。一方面，孙庄村党支部将电商能人培养成党员，并向其赋权，以充实基层党组织力量。在孙书记看来，“自己富不算富，将左邻右舍、全村人都带富，才算孙庄的能人、功臣”（访谈记录20240522-A）。另一方面，孙庄村党支部还将党员培养成电商能人，党员电商业务能力的精进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传、帮、带作用，并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孙庄村党支部将主题活动的内容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结合在一起，以提高党员电商经营能力与综合素质，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了解村民诉求，并更好地解决村民遇到的困难。同时，孙庄村还将党建力量融入电商经营之中，开展“党员网商亮身份、党员网店亮标识”的“双亮”活动，设立“共产党员网店”示范岗，由此以党员身份约束电商经营不良行为并提升信誉。此外，孙庄村的赋权动员还意味着充分发挥党员与电商能人的联系群众作用，开展党员“承诺、践诺”行动，制定党员“访民情、解民忧”积分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孙庄村还注重依靠党员、能人来

①蒯正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山东省花园镇的考察》，《探索》，2024年第4期。

②《给浙江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的回信》，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67页。

③郭红东，曲江，李晓康：《中国县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之路：基于山东曹县、江苏沭阳和浙江临安的实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动员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议事协商中,并注重倾听村民对乡村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三)横向到边的赋能:孙庄村有机动员的村民"道合"

"横向到边"意味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与支持系统,由此提升村民的经营能力与参与治理能力,并实现村民在"道合"基础上的分工协作。

其一,孙庄村党支部注重提升村民数字技术使用的可行能力。按照范戴克构建的"动机—物质—技能—应用"个体数字接入时序模型[①],孙庄村电商产业发展初期(即笔者提炼的"机械动员"阶段)更为关注的是村民的动机性与物质性接入,而成熟期(即笔者提炼的"有机动员"阶段)则注重提升村民的技能性与应用性接入能力。

在提升村民技能性数字接入水平方面,孙庄村建立"乡村振兴大讲堂"的电商技能培训制度。比如孙庄村从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聘请专家学者,讲解开展电商的好处、方法和技巧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庄村制定并落实了相关技能培训制度,但是村民在实际操作中仍会面临各种实践问题。为此,孙庄村组建了电商发展青年智囊团,为数字技术使用能力较强、思维更为活跃、接受新事物较快的青年人提供平台,由青年人带动老年人提升数字技能。由此,孙庄村依靠代际互助,构建起电商产业的经营技能与数字技能之间的双向赋能,具有较多经验与阅历的老年人可以提供求稳的保障,而具有较多新观点和新思路的年轻人可以开拓创新,同时避免代际数字鸿沟的形成,强化亲缘关系的联结程度,减轻老年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被剥夺感。

在提升村民应用性数字接入水平方面,孙庄村注重挖掘村民的差异化优势来开展分工与协作。在孙庄村电商产业的深度发展期,孙庄村意识到家庭式小作坊的经营模式存在着增收持续性弱、市场化运作能力弱、创新能力弱等弊端,便引导此类模式的经营者向正规化企业转型,向外拓展资源,形成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同时,为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并构建完整产业链条,孙庄村建立"电商一条街"与"辅料大市场",以解决运输成本高、生产资料紧缺等问题,并依据村民不同的生产基础而强化其优势,形成布匹、绣花、缝纫、摄影、美工、服装包装、服装熨烫、收发快递等分工。另外,乡村电商产业是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较快的行业,孙庄村开展了集思广益的新产品开发研讨班,并依靠快速维权等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此种协作有助于避免服装款式的互相抄袭或压低价格、降低品质的恶性竞争。此外,孙庄村还建立起资金互助制度、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制度,旨在通过制度形成良性的乡村电商经营环境,并构建起村民之间横向关系联结的协作网络。

其二,孙庄村党支部注重提升村民合作互助能力与参与治理能力。孙庄村通过制度构建起村民的"互动仪式链"[②],并激活共同生活、面对面交往的"附近"的力量[③],实现村民公共精神的复兴与共同体情感的累积与再生产。首先,孙庄村注重村庄基础设施的物质空间搭建,如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党建文化长廊、科普文化长廊、文化广场、乡村大舞台、健身器材、关爱儿童一条街等;其次,孙庄村注重村民关系联结的组织平台搭建,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秧歌队、舞蹈队、徒步队等;再次,孙庄村注重村庄精神文明建设,如开展"五好"村民、"五好"媳妇、"五好"婆婆、英俊少年等榜样评比活动,并组织忠孝讲座等集体活动。这些常态化的治理制度构建起有别于其他村村民的、只有孙庄村村民才能享有的"内外有别"权利,这种发展成果享受资格限定性发挥着巩固村庄内聚的作用[④],有助于提升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性与持续性,并实现了村民的关系拓展。更进一步地,孙

①Jan A. G. M. van D.,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Digital Divide Turns to Inequality of Skills and Usage", in *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book 2012*, Jacques Bus (ed), Amsterdam: IOS Press, 2012, pp. 57-75.

②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互动仪式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③Xiang B.,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Vol. 8, No. 2&3, 2021, pp. 147-165.

④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庄村试图将每一位村民培养成“能人”，这既意味着村民要对自己及家庭成员的生产与生活有着较为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还意味着动员者要基于优势视角，发现每一位村民的能力，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协商之中，并使其自发地组织开展相关公共活动。

概言之，横向到边的赋能有助于将个体化的“你、我、他”变为具有共同性的“我们”[①]。孙庄村的产业发展，使得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稳定且有保障，进而使得家庭愈发和睦、邻里愈发团结、乡村民风愈发和谐；同时也重塑了村民尊重契约、团结互助、积极主动等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孙庄村实现了情感的交互，提升了村民对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又向村民提供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小结

本文从孙庄村的发展转型实践中提炼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机制升级的框架——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表现为初级形态的结合体与高级形态的复合体两种实践样态，二者能够在建成后共存。相较而言，结合体的构建侧重于动员人数“量”的叠加，从而形成“1+1=2”的规模效应，因而其动员效能可被还原为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孙庄村种植大棚蔬菜以及发展电商初期的动员目标均在于扩大参与人数，以在外部竞争中强化集聚优势。而复合体是治理主体间依靠分工、彼此需要、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功能型耦合结构，其构建侧重于复杂性系统中动员效能“质”的涌现，从而形成“1+1>2”的创造效应，因而复合体构建过程中的动员效能是不可还原的，每一个个体均是不可或缺的积极行动者。孙庄村电商发展成熟期的治理目标是构建起联结上下、内外等多重治理要素的复合体，而复合体所具有的合作网络、组织体系等特征均不是单一治理主体所具有的，而是在关系互动过程中得以形成的。

其二，机械动员与有机动员是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两种实践样态的相应机制。机械动员依靠能人的“情”来动员村民开展具有同一性的社会行动，进而凝聚起乡村社会成员力量之“和”，并在村民“志同”的基础上建构起乡村社会治理的生态秩序。孙庄村的机械动员强烈依赖孙书记个人的权威及其他村民对孙书记的信赖与认同，在产生较强的动员力的同时，也蕴含不稳定性，也就是当能人抽离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面临解体危机。为保持孙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性，孙书记开始谋划“能人抽离”的“有机动员”，即依靠制度明确“道合”的方向，同时挖掘社会成员的差异化优势，并形成村民间功能型耦合的关系，进而在关系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村民的义利观、权责观、公私观、家国观等，以培养村民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情感，建构起更具韧性的心态秩序。孙庄村的有机动员依靠制度建设得以协调村民间关系，强化了村民个体的优势，进而使得村民围绕电商经营的目标而开展分工协作与互惠合作。概言之，从机械动员到有机动员体现了延续性变化、辩证性转化、内生性演化的关系升级特点，其本质是由感性生成理性，再由理性生成公共情感的过程。

［责任编辑：王文娟］

①徐勇：《构建“我们”——以“共同缔造”的理念与实践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